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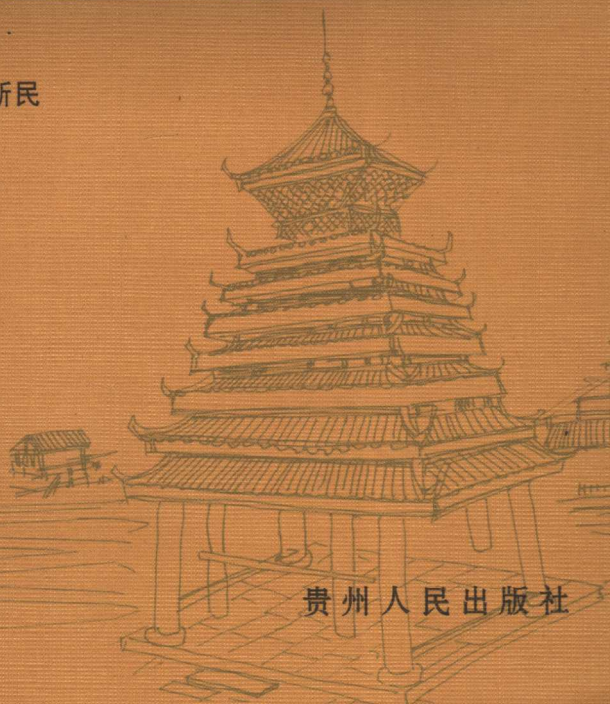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

ZHONGHUACHUANTONGWENHUAYU
GUIZHOU DIYU WENHUAYANJIULUNCONG

研究论丛（一）

主 编 / 李建军

执行主编 / 徐之明 张新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

ZHONGHUACHUANTONGWENHUAYU
GUIZHOU DIYU WENHUAYANJIULUNCONG

研究论丛（一）

主 编 / 李建军

执行主编 / 徐之明 张新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 / 李建军主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21-07477-1

I. 中... II. 李...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②文化-贵州省-文集 IV. ①G122-53②G127.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2187 号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一)
主 编	李建军
执行主编	徐之明 张新民
责任编辑	钱海峰
封面设计	唐锡璋
版式设计	南 山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14.75 印张 370 千字
印 数	1050 册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477-1/G·2453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总论(代序)

本土关怀与区域发展

——再论建构“贵州学”的几个问题 张新民(1)

第一部分 贵州地域文化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风情与文化

贵州“民族风情”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 龚妮丽(17)

贵州省雷山县永乐镇格益村长高寨苗族吃鼓藏

..... 张业强 杨 兰(26)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甲定村苗族敲牛祭祖调查报告

..... 詹 颖(41)

岜沙苗民生活习俗的人类学诠释 庄 勇(55)

浅谈德江土家傩文化中的融汇现象 郑国周(67)

贵州建筑与环境保护

顺应自然的古市政与古建筑艺术

——名城镇远的人文生态环境小议 黄俊杰(77)

贵州少数民族干栏建筑缘生的历史叙事

——隐退在时空维度中的干栏身影 王良范(84)

王阳明遗像综考

——兼述贵阳阳明祠所藏之阳明像 钱 明(99)

不应消失的古建文物

——关于梵净山地区古凉桥的现状与保护

..... 张桂林(123)

贵州宗教、教育、医药

梵净山佛教源流考 张 明(134)

新政前期的贵州现代教育及其评价 林 芊(150)

关于苗族医药研究的哲学思考 麻勇斌(163)

孔、曾、思、孟儒学视域中之阳明心学 张连顺(179)

贵州方言与文化

贵州方言所见元明清白话词语例释 徐之明(214)

贵阳方言的“下”字 涂光禄(226)

任可澄文献思想与实践 罗正副 代政洪(232)

万马如龙出贵州

——贵州明清走向全国和世界的文艺家述评

..... 黄万机(239)

试论孙应鳌易学对贵州明清易学的影响 王路平(261)

《柳如是别传》中的杨龙友 黄富源(285)

关于福泉市历史文化与旅游开发的思考

..... 陈昌茂 杨映军(292)

第二部分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学研究

张衡《归田赋》对魏晋文学的两大影响 王晓卫(317)

郑珍父子的《说文》逸字研究 袁本良(327)

郑知同《楚辞考辩》析论 梅桐生(340)

《南齐书》的文体构成及语料价值 黎 平(354)

论《诗经》中的方位及其文化意蕴 谭德兴(360)

传统宗教与思想研究

道教咒术的功能形成机制 龚晓康(375)

从忏悔观到忏悔仪,再到经忏佛教 宋立道(385)

东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价值重建

——以布伦塔诺哲学与佛教唯识学比较为例

..... 许为勤(412)

儒学与哈贝马斯哲学浅较 陈 龙(433)

总论(代序)

本土关怀与区域发展 ——再论建构“贵州学”的几个问题

张新民

地域性综合学科“贵州学”的倡导建立^①,引起了学术界各方面朋友的广泛回应。笔者认为,“贵州学”能否成为一门真正具有独立题域的专门学科,除广泛系统的高水准学理讨论之外,主要取决于有无相应的具体研究成果,当然也有赖于今后跨学科研究空间的不断拓展。因此,“贵州学”实际只是一后设概念,更多地反映了学者的理论自觉,以及对本土文化建设的关怀。然而无论如何,理论体系方面的探讨总是学科建设的必要前提,有必要深入论述以求进一步达成共识。故再就有关问题略陈管见如下,并希望听到更多的建设性的批评讨论意见。

一、“贵州学”与问题意识

建构“贵州学”的一个重要思考内容,乃是如何面对现代性的难题。大家知道,当今遍及世界各地的一个重要文化景观,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大变动。而无论在任何地区,现代化进程都是一场“总体变动”,不仅涉及外显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也改变了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引发了生活世界的整体性

转型,也导致了人的实存状态的全面性重构。尽管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当突出,我们很难为现代性现象划定一个统一的历史时间,但无论是作为全球性地缘经济文化结构的局部地理区域,抑或是作为中华版土范围内不可分割的重要行政省区,贵州都已置身于现代性的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语境,步入了以“现代化”为价值诉求的崭新发展阶段,面临着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的巨大深刻的变化,不能不把现代性纳入区域知识学(贵州学)的根本范畴。

现代化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变化发展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时,就更容易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崭新问题,需要学者作出理论性的积极回应,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知识学的架构,以便能对传统与现代二者都作出合理的阐释和智慧的抉择,从而谋求切合于自己的、多元并存的发展路径。“贵州学”作为一区域性的知识学构架,自然会有自己的特殊的研究题域和复杂的问题意识,然而无论研究题域有多么特殊,问题意识有多么复杂,都必须切合于自身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置身处境和现实际遇,离不开对地区现代性独特问题的客观审视和关注。因为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演进过程,固然是本土经济文化发展当有的出路,但相应于不同区域仍有其特殊性格和面貌。所以我们提倡分析其共同性(共相),自然也更重视其特殊性(殊相)。

“贵州学”的言述方向乃是一知识学的方向,知识学的言述立场必须尽可能地公正与客观,以清彻的理性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传统与现代接榫问题、古代性与现代性的实质性关联问题、现代化内在动因与发挥地方资源优势问题、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文化变迁与现代性断裂问题、族群文化差异与交流融合问题等等,着重研究“实然”而不空言“应然”。即以问题为线索不断追问分析,从而形成知识学的问题网络,在尝试探索未来贵州合乎时代要求的现代性之路的过程中,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区域学

学科体系。现代化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不清楚认识自身区域的问题和优势,便不可能获得成功。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性既是全方位的结构性秩序转型,必然也关涉到包括学者在内的群体的安身立命基础的重新设定。因此,真正以学问为安身立命归趣的学者,必须尽力培养自己不依傍任何门户的独立知性探求精神,从自身特殊的文化处境和真实的问题意识出发展开研究,同时适当保持理性反思所需要的知识学距离和客观心态,才能在主客两方面开辟诸如“贵州学”这样的知识学架构或人生学问的新境界和新天地,在本土学术研究方面(如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及转型的解释等)建立起真正属己的学科体系。“贵州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地域学科的应时而出,说明了它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深厚现代性含义的学术事业。

由问题意识引出的具体探索,也可称为问题探索法。随着“贵州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当然还会有各种新的问题出现,而围绕各种问题展开的探索,也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的建构,如此由问题入手不断扩充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贵州学”本身也会有不断开拓、发展、成熟、完善的学科前景。

二、本土关怀与现代化建设

以贵州独特的地理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贵州学”,当然其中也内涵着学者对本土文化的理性自觉和关怀,表达了知识分子以知识学立场参与地方现代化建设的责任和热情,展示了各方面专家在更深的学理层次上研究和认识贵州的学术路数和学术方向。

世世代代生息和劳作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无论过去或今天,都曾创造了与雄奇壮伟的地理山川对应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一中华文化涵盖下的独特地方文化(广义的文化),不仅

其本身已是极具学术意蕴、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性存在,而且更是地方民族群体安身立命的生活根基,值得每一个关心桑梓建设的人密切注视它的过去,分析它的现在,预测它的未来,并时时处处以知识学的立场校正它的发展方向。当然,如果说本土研究是实证知识学的,那末,本土关怀就是批判价值论的,二者之间如何保持适当的张力,也是“贵州学”的构建必须考虑的问题。

本土关怀的价值热情必须建立在知性分析的客观基础上,以批判的精神探索符合省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贵州的山川自然、历史传统、人文族群共同组成了自己的结构性生境,不仅地理环境独特,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族源族系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特别是从小传统或民间资源的角度看,其文化积淀显得极为深厚,大小传统之间碰撞交融的现象也十分突出。民间或小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形式中,是否存在现代性的精神(软件)动因,有无现代化工作精神或商业化价值理念,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变迁力量,同时又不丧失本土固有文化自身的主体性,都是本土关怀视野下必须面对的研究难题。这也意味着“贵州学”如要达到现代学术的高峰,并与国际地域研究的前沿接轨,就必须重新发掘贵州大小传统的一切资源,并将其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全面充分地展示出来。

不可否认,贵州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与外部力量的碰撞交流,较之其他发达地区尤显得缓慢。即一方面由于中原文化的不断输入,特别是大量移民的世代开拓,民族迁徙带来的杂居融合,以及商业贸易沿交通干线辐射扩散造成的示范性影响,使贵州整体文化始终处在变异或变迁之中: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特别是喀斯特山地导致的封闭和滞后,也使贵州区域文化更多地保留了传统习俗的孑遗,原生形态的文化仍在不少地区有所保留。近年来学者屡次讨论到的“贵州现象”——富饶的贫困,就概括地说明了贵州生境与文化的特点。

而扶贫(现代化)问题既是贵州决策部门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出于本土关怀而建构“贵州学”当下的意义所在之一,或者也可说是“贵州学”研究视野的忧虑焦点。因为地域学之所以能成为独立学科并具有长久生命力,即在于它面对的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区域性特殊问题。

由于真正的本土关怀总是与其对象处在相互关联的亲性和场域中,所以容易转化为生命实践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既要积极肯定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完整性,也要充分彰显人的生命存在及其需要的完整性,在实现区域外部整体性全面发展目标的同时,更要关注作为整体的人如何发现和获得意义的内部问题,使本土人民生活的世界不仅是富庶康乐的,而且也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由此可见,真正高瞻远瞩的本土关怀,必然是立足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完整性关怀,它植根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然而又超越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关注地域和时代局部的问题,更关注世界和人类整体的问题,既是日常世俗的忧虑的关怀,也是终极超越的运思的关怀。能否做到这一点,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建构“贵州学”随时都应审视和反思的。

三、整体区域观与整体研究方法

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各种实践经验的逐步累积,更离不开理论化的理性自觉。所以,建构“贵州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诉求,即是在理论及实践两方面都作出知识学的回应。而知识学的回应不能不有范式类型或方法论的尝试和突破,整体区域观与整体研究方法就是这种尝试之一。

“贵州学”是以本土独特的地理文化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区域并非平面单一的某种空间存在,而是万千复杂关联关系与复合(主从)关系的整体——实存关联的整体、意义复合的

整体。因此,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如果不联系其他方面考察,其读解和阐释必然就是肤浅片面的,而要取得真正有意义的本土研究成果,就必须强调全面、整体(总体)的区域观的重要。

整体区域观将贵州地理文化区域视为一个全面多元的结构性整体,注意以相互联系的观点考察、评估、判断、诠释各种文化事象,从社会和文化的宏观全貌入手研究局部微观的问题。区域社会和文化结构有着多种多样的头绪,有共时性的,也有历时性的;有表层显象的,也有深层内隐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特殊多元的,也有普遍统一的;有恒态或常态的,也有变异或变形的。所以不仅要近距离逼视其微末细节,而且更要远距离遥观其恢宏全局;不仅要就区域内部展开微型模式的比较分析,而且更要进行(外延更大的)跨区域的巨型模式的比较分析。目的在通过(多种方法配合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区域学知识理论体系——与地方经验或实践相一致的、有自身语法(逻辑框架)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同时也使经验或实践更具有知识学架构的前瞻性理论含义。

建构性的整体区域观注意在更深广的时空范围内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揭示区域整体社会运作模式及其发展走向的(不可简约化的)“全息图景”,认为不能把社会生活的各个复杂面相切割开来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应透过结构性的区域整体凸显它们的互动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宏观整体研究可能带来的空洞与抽象,“贵州学”也力图深入局部微观的研究领域,但即使是局部微观的研究领域,也必须包容整体宏观的视角,也就是说局部乃是整体结构中的局部,微观乃是宏观视域中的微观。局部微观的小天地之所以有研究价值和意义,正在于它是更广大世界的一部分,参与着区域整体世界的构成,是内涵丰富能照亮整体特征的局部,有着生动可靠的历史具体性或区域象征性。一旦脱离了整体的

世界,局部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体特征与微观生动两方面都丧失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强调整体区域观,也可说即是强调方法论上的完整性和全面性,避免由于方法论的简单或约化而造成对区域整体的任意肢解——局部研究方法看来是正确的结论,整体研究方法看来则未必正确。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整合力量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更有必要注意方法论的完整和全面,重视研究手段的周延和完善。这也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建构“贵州学”综合地域学科,并力求作出整体的建构性解读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跨学科研究与“换域”研究

为了建立高水准的“贵州学”学科知识建构体系,我们认为还有必要提倡跨学科的研究,亦即以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和求实求真的知识学理念,广泛吸纳一切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优长,展开区域性的学科整合研究,并在不断自我调节修正和改进充实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贵州学”的方法论体系。

我们之所以提倡跨学科的综合(整合)研究,不仅因为“贵州学”涉及的题域极其广泛,而且更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结构与功能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必须发挥不同学科解决共同问题的相关优势,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沟通与配合协作,在共同的求实求真的知识学理念的指引下,对复杂社会生活的各个研究题域(如经济、科技、历史、政治、伦理、心态、习俗、审美、宗教等),都作出相应学科的创造性探讨,并力求以包容性及关联性极强的“贵州学”为整体范式,尝试综合各个研究题域的具体成果。这种综合实质上也是分析之后的综合——不断循环反复意义上的(再)分析之后的(再)综合,目的为超越单一学科的视野局限,避免化约主义的武断偏失,使博采学际间分别与联系之长的跨学科

研究的意义与成效,真正在“贵州学”这门具体的综合性地域学科中得到示范性的落实和彰显。

“贵州学”跨学科研究固然需要通过不同学者之间的分工合作,以共同谋求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与深入发展,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者本人分析架构及研究视域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易言之,即不仅是单个学科相互之间的成果借鉴与内容组合,而且更是题域定点研究过程中多种学科方法或观点同时观照产生的视野融合。正是在融合的方法论研究视野中,才更容易克服边见(一边之见),避免武断,从而激发思维,开拓思路,也才更容易推进知识领域的发展,获取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所以,我们强调广泛借用一切有助于学术发展的方法论工具,举凡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结构学、符号学、诠释学等都值得重视,善加利用都有互补的效果。要在透过不同方法的交叉观照和互动使用,建立融合的研究视野,提高学科整合的能力,并以新的研究范型或知识架构,不断丰富“贵州学”的学科内涵。

为了获取跨学科研究的广阔融合视野,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开展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此点过去已论及,兹不再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鉴于本土研究容易导致研究方法上的盲点,即为了避免对过于熟悉的本土经验或观念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的弊病,在研究视野及方法上适当进行“换域”——不同地域的交叉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通过“换域”研究,我们才能形成兼容异文化与本文化的多重视域,获取必要的本土研究的参照系统,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找到知识学远距离旁观必需的比较根据,在跨越不同历史文化和多重时空力量并将之融会贯通的慧识——当然也是能够洞见各种症结的慧识的烛照下,主动对自己从小习得的司空见惯的本土经验或观念作出知性的反省,亦即有目的地参考其他知识/文化类型来深入透视和分析自己的问题。因为在本文化中构

成冲突的问题,在异文化中也许根本不是问题,所以进入异文化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化,恰如观照他人颇有裨于观照自己一样。在跨文化“换域”研究的多重(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的)视域中,我们不仅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了别人的问题,而且也通过比较架构的建立,更好地返回了自己的问题;不仅因进入异文化而走出(超离)了本文化,同时也由于借助了外在异文化的观照视角而真正深入了本文化。这种“出得去”、“进得来”的学理性研究态度和独特审视取向,对创立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贵州学”学科理论体系而言,它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

具有本土特色的“贵州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或创立,当然需要有一套与之相应的特殊方法论。因此,在博采兼收其他学科一般方法论为自己的特殊方法论的同时,也有必要尝试建构由自身理论意向开出的具有高度适用性的方法论。当然,理论体系的独特性与方法论的普遍性之间,也应保持适当的能够不断导致更高一层和谐的互动性张力,并随时利用本土传统和现代性的经验来修葺和匡正理论,创造性地谋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充实,使理论与方法都具有开放的性格而日益严密化,这也是我们尝试“贵州学”建构的又一重要旨趣。

五、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解释体系

如前所云,“贵州学”的建构就是要加强本土人民的实存使命感和人生责任感,总结思想传统与人文历史得失利弊之所在,探索未来贵州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之路,唤起本土文化通过具体实践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主体性自觉。主体性的文化必须有主体性的话语,“失语”状态只能说明文化精神力量的微弱。因此,传承、积累、转化、发展自身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应建立起精神内涵深厚强大的主体性系统话语,在多元文化及其话语同存并置的当

今世界,力求能听到本土参与全球对话的相互主体性声音。这也是讨论“贵州学”建构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与贵州悠久丰富的人文历史传统和独特多元的民族生境文化相比较,我们始终缺乏相应的可与其他区域对话的主体间性话语系统。由于儒家华夏中心观及泛道德论的影响,历代学者总有抬高“大传统”(中原儒家文化)而贬低“小传统”(边地民族文化)的心理偏差或纠结,“非我”或“他者”的话语方式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总要吐露在笔下。只要稍试翻阅最能代表儒家文化意识与历史情结的“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它们有关贵州及其他边地民族的系统记载,大多为“文明人”(我)对“野蛮人”(非我)居高临下观察心态的符号外化(司马迁略例外),实乃权力形式及其相互联系支配下所形成的历史的知识体系^②。所以像贵州这样的边地民族文化,她的内在真实价值和意义,近代以前总是遭到正统儒家学者的忽视,民间草根性社会在中国文化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性,也经常为上层知识精英估计不足。也就是说,传统过分关注大传统精英秩序,忽视了小传统草根文化秩序。其实只要以相互主体性的尊重态度深入本土社会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边陲少数民族文化也内涵一套自己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有独特的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解释模式和概念词汇。尽管它们多数以集体记忆的方式代代口授心传,并无完整的文体历史和典籍系统,但仍有着丰富的可供转化的内在资源和植根于实践之中的生活创造内容,并非都是与“现代性”对立的没有变迁潜力的文化实在。不仅值得一切有过分精英立场而造成思路盲点的人主动转换视角加以了解,以此调整缺乏同情和尊重的言述方向,扩大知识学能向上亦能向下观察的眼界,而且有必要采用多样化的文本模式重新如实描述,寻找其思维和运作的复杂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提炼具有自身文化动因又涵摄现代性意义的本土可持续发展理论。从而在解构分析与重组再建二者并重的基础上,创立本土涵摄面

极广的系统完整的主体性话语。

西学东渐之后,以西方概念削足适履地图解本土,则是近代以来值得冷静反省的又一文化现象。不少学者动辄就依西方标准将本土历史文化视为理性和科学的敌人,以致“反传统”竟一时汇成学术话语的主流而不断得到意识形态的强化。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传统资源不仅成为由权力变迁过程派生的知识结构所必须彻底否弃的对象,同时更是西方理论范式粗暴剪裁、恣意玩赏的异国素材或他乡古董。他们忘记了在不同生境场域中分头发展的中西文化,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可以相互简单套用的绝对话语理论或研究范式。站在学术反思的立场上重新进行审理,我们有必要追问,根据西方文化变迁历程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相关理论,究竟是否可以用来解释其他具有文化差异的非西方社会?在西方强势文化及价值观念席卷天下、称霸世界的情况下,我们过去的研究成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仅是西方理论自觉或不自觉的推衍和表述?有无必要以知识学的客观立场真正反映本土文化经验和观念的实际?面向未来的学术选择究竟是要成为西方思想或观念的附庸,还是要根据本土文化和社会的现实来总结提炼自己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面对一切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都是舶来品的现实,特别是吸纳现代西方方法论成为一种时髦而殊少予以慎重过滤或考察的现象,我们是否有必要摆脱对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的盲从,重建本土从自身问题出发的解释体系?

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孤立”和“封闭”中去,也不是要中断与西方真正有学术意蕴的平等智慧的对话,更非提倡本土中心论或地方中心论——社会/文化发展互惠互利的“谈判”永远都是必须的,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可取^③。恰恰相反,我们主张站在中西交汇互补的时代高度上,建立有自身的现实考察依据的理论解释体系。这种解释体系在大量吸收并消化一切有益的外来思想文化资粮,经过彻底本土化而为我所用(即化为自